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2年9月16日 (第268期)
仅供参考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学者提议建立一项“元制度”来指导大国关系

沃尔特等学者提出建立一个包含四部分的框架来指导大国之间的关系。该框架不是强加一套详细的规则，而是作为一项“元制度”发挥作用，指导对手甚至敌对国家在一系列问题上寻求协议或妥协。

中美关系

取消对华关税有助于降低美通胀预期

美国《巴伦周刊》(Barron's)网站9月7日登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克莱德·霍夫鲍尔(Gary Clyde Hufbauer)的文章称,若拜登政府取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将降低美国通胀预期。文章摘要如下:

通过设置进口壁垒,特朗普阻碍了美国参与全球市场。当疫情中断了所有产品的供应,各国政府通过打开货币和财政水龙头来应对时,通胀爆发了。即使没有特朗普加征的关税,全球经济的闲置产能也无法满足美国对各种商品迅速增长的需求。

白宫正在考虑削减关税,但未设置具体期限。计量经济学分析表明,2018年征收关税时,购买汽车零部件和半导体等中间产品的美国企业和购买玩具、家具等终端产品的美国家庭支付的成本上升。由于世界经济动荡,这种更高的成本无法在2022年迅速逆转。

从短期来看,拜登取消关税的决定对推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下降作用不大,因为订单需要时间装运和发送。从中期来看,取消对华关税将有助于抑制通胀预期。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分析,从更长期来看,随着各国央行通过提高利率挤压需求,从而使劳动力和商品市场回归更正常的状态,取消对华关税将使CPI下降1.3个百分点。

若美中两国领导人能在11月份G20巴厘岛峰会期间会晤,将为双方达成关税协议提供良机。两位领导人可以通过废除关税来缓和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并重启两国关系。这将为走向第二次冷战按下暂停键,缓解美国的通货膨胀,并提振美国出口。

美民调称公众对中俄好感度降至历史低点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网站 9 月 12 日载文称，调查显示，如今美国公众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好感度降到了该机构调查史上的最低点。

该机构 7 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若用 0 分（最低）至 100 分（最高）来给对中俄的好感度打分，美民众给中国打出的平均分为 32 分，俄罗斯为 22 分。总体上，相比中国的“领土野心”（52%），更多美国人认为俄罗斯的领土野心（60%）对美国构成更大威胁。两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民主党人更关心俄罗斯的领土野心（68%对 56%的共和党人），共和党人则更关心中国野心（62%对 50%的民主党人）。

此外，根据该机构今年 3 月的一项调查，57%的美国人认为俄罗斯是敌手（高于 2021 年的 39%），是一个美国正与其有冲突的国家；14%的人认为俄罗斯是对手，是一个美国需要与之竞争的国家。22%的人认为中国是敌手，31%的人认为中国是对手，23%认为中国是必要的合作伙伴。

调查还显示，73%的美国人认为，如今美国在全球备受尊重，34%的人认为中国受尊重，仅 12%的人认为俄罗斯受尊重。

美专家分析美对华出口持续下滑原因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专家查德·鲍恩(Chad P. Bown) 9 月 12 日撰文称，2022 年美国对华能源和半导体产品出口下降，这主要是因为日趋紧张的地缘政治影响到全球贸易。

文章称，今年美中整体贸易量没有改善，美国对华商品出口停留在 2021 年的水平。相较于 2021 年，今年美国能源产品出口下降 13%，制造业基本持平，只有农业增长 16%。不断恶化的宏

观经济状况不利于美中贸易。2022 年中国因新冠肺炎疫情实施封锁，进口需求降低。而美国通胀不断升级导致美联储在 3 月份开始加息，自此美元对人民币升值了 10%，这使美国在华出口产品更加昂贵。

2022 年全球能源市场的动荡主要由俄乌战争引起，这反映在美中液化天然气、原油和煤炭等产品的贸易减少上。2020 至 2021 年，美国上述产品的对华出口都大幅增长。如今美国大幅增加了对欧盟和英国的液化天然气、石油和煤炭出口，而中国则满足了俄罗斯寻找新的能源产品出口目的地的需求。

美国制成品出口也受到影响。即便是一度繁荣的半导体行业，出口似乎也已见顶，并可能进一步下降，部分原因是军事冲突威胁加剧，导致美国增加并扩大出口管制。尽管农业总体上仍是美国 2022 年出口的亮点，但猪肉、小麦和玉米等产品面临新的担忧。如果出口销售的高价值是由与全球短缺相关的更高价格而非更高的发货量带来的，那么出口销售的高价值可能具有欺骗性。

在美中贸易战休战以来，两国都没有征收任何新关税，但两国也未取消贸易战带来的任何关税。2022 年美国的高通胀为拜登政府创造了机会，至少可以部分重启对华经济政策，但中国对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的回应，似乎粉碎了任何抓住这一机会的政治意愿。贸易条件变得更糟了，除了收紧出口管制外，美国 6 月份进一步立法限制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拜登政府还选择不延长此前批准的 2018 至 2019 年许多贸易战关税的排除条款，其经济影响实质上是关税增加。

美应制定新战略避免在技术竞争中败给中国

美国《外交事务》期刊(FA)网站 9 月 8 日载文称，为在技术

竞争中打败中国，美国需要一项以技术为中心的国家竞争力战略。

文章称，为了在下一波技术创新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正与中国开展高风险的竞争。尽管过去三年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但华盛顿主要在追赶，这种被动做法难以为未来的成功打下基础。

就在华盛顿瞎折腾的时候，北京的高科技研发集中化系统正在运转。华盛顿怎会让事情变得如此糟糕？答案在于：美国是个技术超级大国，但又存在重大技术漏洞。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华盛顿需要一项以技术为中心的国家竞争力战略，并利用当代的创新生态系统。

要实施该战略，美国首先要确保不会再次被“5G化”，制定一项国家行动计划，投资、激励和加速生物技术、量子计算、能源生产和存储新形式、新的制造模式和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创新。

美国还需解决生产关键技术的能力不断下降的问题，以及对主要竞争对手供应链的依赖。联邦政府需迅速和有效部署5G和光纤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支持针对下一代应用开展更多基础研究和试点，帮助在关键行业培养一支精通技术的劳动力，并且与私营部门合作发展先进电池、永磁体和微电子的制造能力。

与此同时，华盛顿需要将自己与中国不当的经济行为隔离开来。以技术为中心的战略还需要采取一种平衡的方式来管理技术监管。如果美国发展出一种技术治理模式，既维护民主价值观和规范，又支持颠覆性创新、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就能获得竞争优势。当有必要进行监管时，联邦政府应依靠现有的监管机构，针对各个行业的新兴技术制定规则。

美国必须重新向盟友作出承诺。华盛顿及其盟友和合作伙伴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未来有共同利益，它们的集体资源可以超越北京的规模优势。美国及其盟友应该把重点放在各自具有相对优

势的领域。例如，即使美国在出口 5G 网络和技术方面缺乏商业领导者，它也可以利用其金融工具来支持盟友阻止华为、中兴或其他中国公司获胜。

美国还需要重振公私合作，引导私营部门将精力投向战略技术项目，以协调科学投资和研究议程。《芯片与科学法案》授权 5 亿美元建立国际技术安全机构，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

新的竞争力战略如果不能应对美国硬实力日渐衰弱，就会失败。华盛顿必须更全面地接受基于网络的作战。到 2030 年，美军必须将人机协作完全整合到其行动的各个方面，并开发低成本、易制造的人工智能平台。五角大楼应追求并保持软件霸权，为战术软件开发创造新的专长，并培训领导者如何利用软件实现军事优势。

最后，美国情报界必须适应当代数字环境的挑战，进一步关注外国技术发展趋势。美国情报机构需加速数字化转型，必须更新安全和人力资源流程，以确保最好的人才和技术可以安全地整合到情报界并在整个情报界推广。

美国外交

美学者建言美泰加强合作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网站9月2日登载该机构东南亚项目高级助理默里·希伯特(Murray Hiebert)的文章称，拜登政府正加强与泰国的关系，并决心不让民主和人权议程影响其战略考量。文章摘要如下：

近期，美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接连访泰。布林肯在访问期间与泰国外长签署了《战略联盟和伙伴关系公报》。新

的联合公报扩展了美泰关系，从军事关系扩大到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威胁、增强执法合作、加深网络安全和技术创新合作等领域。奥斯汀则在访泰时表示，希望加强与泰国军队的互操作性，并支持泰国军队的现代化需求。今年 11 月，泰国将举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泰国希望届时拜登能访问泰国。

自 2014 年泰国发生政变以来，美泰关系进入不稳定期。在政变后几年中，美国更多关注越南和菲律宾，泰国则与中国走得更近。尽管美泰贸易在疫情期间有所回升，但中泰之间的贸易量仍然比美国大得多。泰国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很容易就能进入中国市场，但美泰之间至今未签署任何贸易协议。

与许多东南亚邻国一样，泰国寻求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现在，泰国似乎更多寻求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而非联盟关系。为此，两国需要通过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共同应对网络安全攻击等方式，来构筑信任并探索合作机遇。

美国应通过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在中亚发挥作用

美国《国会山报》（the Hill）网站 9 月 9 日载文称，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中亚地区仍然是美国能够而且必须继续发挥作用的地区。美国应加强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在中亚发挥建设性作用。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试图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国际民主国家联盟，对与那些不被视为模范民主国家的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一直犹豫不决。但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这种做法是短视的，尤其是考虑到欧亚大陆目前的战略环境。俄乌冲突使中亚国家认识到，他们易受俄罗

斯和中国压力的影响。这也加强了他们相互合作以及与西方合作的决心。

乌兹别克斯坦在中亚地区扮演重要角色，美国可以通过深化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战略伙伴关系，在中亚地缘政治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要真正促进中亚地区的安全，扩大涉及乌兹别克斯坦的运输路线仍至关重要。8月2日，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签署了《塔什干宣言》，该倡议的核心是建设国际运输走廊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TITR），促进贸易和能源流动，以绕过俄罗斯。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的粮仓，拥有约3500万人口，在2019年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改革，结束了童工制度，并向国际资本市场开放，同年，乌兹别克斯坦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266%，此后一直保持稳定。美国应该在乌兹别克斯坦发挥支持性作用，鼓励官员问责制和公共监督，并与乌发展更强大的经济和安全联系。

美国应确保后冷战时代的世界仍有规则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安吉拉·斯坦特（Angela Stent）近日在《外交政策》杂志（FP）网站撰文称，俄乌冲突的爆发标志着后冷战时代第一阶段的结束。美国大战略面临的挑战是，确保后-后冷战（post-post-Cold War）世界仍然有规则，特别是能避免大规模武装冲突的规则。

文章称，俄乌冲突凸显了美国作为欧洲安全保障者的领导作用，也让北约盟国认识到，他们只有在美国的保护伞下才能保全自身的现实。尽管欧盟有种种计划和野心，却并未实现自身战略自治。联合国和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等其他机构也未能充分应对俄乌危机对欧洲造成的安全威胁。

从阿富汗撤军后，北约重新聚焦其最初使命——遏制俄罗斯。而在北约将中国列为对手后，其将与亚洲伙伴开展更密切的协调。美国通过“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以及在亚洲的双边联盟，来领导一个西方集体同时遏制俄中。

然而，面对战争带来的经济后果，包括西方制裁和俄罗斯将能源及食品供应武器化，维持西方国家内部的团结将变得越来越困难。美国必须在国内推行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议程的同时，带头帮助其盟友寻找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替代选项。

美国将面临的一个新现实是，尽管西方国家集体谴责和制裁俄罗斯并支持乌克兰，但几乎整个南半球国家都拒绝选边站队。印度作为美国在 QUAD 的合作伙伴，并未选择批评或制裁俄罗斯，反而增加了从俄罗斯的石油进口。南半球的许多其他国家将俄罗斯视为交易伙伴，并基于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历史，指责美国虚伪。

俄中都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后西方秩序，在该秩序中，美国将不能再制定议程。中国寻求与美国共同制定有规则的全球秩序，而俄罗斯则试图宣扬没有规则的世界混乱。如今美国面临的重大战略挑战是，确保后冷战时代的世界仍然有规则，特别是那些旨在避免大规模武装冲突的规则。

美应制定针对南亚的新战略

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网站 8 月 29 日登载该智库亚洲研究中心南亚研究员杰夫·史密斯（Jeff Smith）的文章称，美国政府应该为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制定一项协调一致的战略。文章摘要如下：

与美国外交政策涉及的其他重要地区相比，美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资源有限，东亚、欧洲和中东继续在美国的战略关注和资源中占据更大份额。相比之下，美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基地和人员相对较少。美国在该地区没有条约盟友，也没有安全承诺，虽然美印战略伙伴关系比美国某些传统联盟更重要。

但是，美国在南亚确实有各种重要或边缘利益面临风险。美国在该地区有三项首要利益。一是美国政府应阻止任何敌对势力在该地区施加霸权影响，为此，美国应当与该地区致力于自由民主的国家联手达成一种对其有利的力量平衡，这需要进一步发展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并推动印度成为在该地区制衡中国的大国。美国应继续推动“印巴脱钩”（de-hyphenation），即不再为了维护巴基斯坦而限制与印度的接触。美国也需要继续发展“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二是美国需要维持其在该地区唯一的军事基地迭戈加西亚（Diego Garcia），以保证其对该地区的军事进入和行动自由。三是美国需要保卫本土免受来自南亚的恐怖主义威胁，从长远来看，打击来自南亚的恐怖主义威胁需要巴基斯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开启美巴关系的新篇章。

美国在该地区还有几个重要的次要利益。首先，防止国家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印巴之间的冲突升级。其次，美国需要促进经济自由，并为美企提供贸易和投资机会。再次，美国应推动该地区的政治自由和人权。最后，扩大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外交、军事和经济接触符合美国的利益。

在一个资源不足的地区，促进和捍卫美国利益需要在更大程度上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一道分担。首先，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促进美国的利益也需要与不完美的民主国家合作。其次，美国必须优先考虑美印伙伴关系的长期发展，而不是短期战术考量，如美印在俄乌危机上的分歧。最后，要真正解决南亚地区的恐怖主

义和极端主义的持续威胁，美国必须将巴基斯坦的长期、根本性变革置于追求眼前的反恐目标之上。

美学者提议建立一项“元制度”来指导大国关系

沃尔特等学者提出建立一个包含四部分的框架来指导大国之间的关系。该框架不是强加一套详细的规则，而是作为一项“元制度”发挥作用，指导对手甚至敌对国家在一系列问题上寻求协议或妥协。

《外交事务》期刊网站近期登载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和该校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合著的文章称，全球秩序正在不断恶化，亟需建立起一种大国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更良性的新秩序。

文章称，如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崛起侵蚀了曾经由美国及其盟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不断增加的平等、再次兴起的保护主义和新冠肺炎疫情终结了后冷战时代的超全球化时期（hyperglobalization）。展望未来，人们很容易想象一个不那么繁荣却更加危险的世界：美国和中国日益敌对，欧洲重新军事化，区域经济集团向内看，数字领域按地缘政治线划分，经济关系日益武器化。

但一种更良性的秩序也不是无法想象。在这种秩序中，美国、中国和其他大国既竞争又合作，并遵守新的、更灵活的规则，以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的核心要素，防止武装冲突，同时让各国拥有更大余地来解决国内紧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作者提出建立一个包含四部分的框架来指导大国之间的关系。该框架不是强加一套详细的规则，而是作为一项“元制度”

发挥作用，指导对手甚至敌对国家在一系列问题上寻求协议或妥协。相比于只关注大国竞争的战略或框架，该方法能够让敌对大国找到共同点，推进经济繁荣，减少重大战争的风险，同时维护自身安全。

在该框架中，主要全球大国不需要事先就管理其互动的详细规则达成一致，只需就其关系的基本方法达成一致。所有的行动和议题都可以被归为四大类：被禁止的行为、两个或多个国家相互调整可使各方受益的行为、涉及单个国家的议题以及需要多边参与的议题。

第一类行为，即禁止的行为，将借鉴已经被美国、中国和其他大国广泛接受的准则。这些准则至少可以包括《联合国宪章》中的承诺、违反外交豁免权、武装攻击另一个国家的船只或飞机。第二类行为包括国家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换取其他国家做出类似让步，如双边贸易协议和军控协议。第三类行为是，当两个国家不能达成互利的交易时，其中任何一方都可以自由地采取独立行动，以推进具体的国家目标，但必须遵守先前商定的禁止规定。第四类议题涉及那些要取得成效就需要多个国家参与的议题，如应对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大流行。这种方法将使竞争国家能够超越“非敌即友”的简单二分法，在长期也将增加合作的可能性。

该框架也有助于提高战略透明度。更透明、更公开的行事方法能够帮助建立信任，因为每一方都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对方的动机和行为。该框架本身无法产生更良性的世界秩序，但可以对大国关系进行指导。以美中关系为例，迄今为止，美国未能阐明其对华政策旨在维护美国重要安全和经济利益，而非通过破坏中国经济来恢复美国的主导地位。通过这一框架，美国和中国将寻找共同的愿景，即限制争论的领域，避免不断增长的敌意和猜疑。

美国政治/其他

美国大学生：女性向左，男性向右？

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网站9月12日登载莎拉劳伦斯学院政治学教授塞缪尔·艾布拉姆斯(Samuel J. Abrams)等撰写的文章称,当代美国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度更高,女性大学生更加偏左,男性大学生则向右偏移。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大学调查平台“大学脉搏”(College Pulse)近期针对美国91所不同院校1500多名大学生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学生们在投票偏好上存在分歧,但最一致的分歧是女性和男性大学生之间的分歧。当前,30%的女性大学生自认为是民主党人,只有20%的女性大学生自认为是共和党人。在精英大学中,这种差异更大。在排名前25位的大学中,45%的女性大学生自认为是民主党人,只有7%的女性大学生自认为是共和党人。

令人惊讶的是,大学里的男性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39%的男性大学生自认为是共和党人,只有21%的男性大学生自认为是民主党人。在排名前25位的大学中,40%的男生自认为是共和党人,25%的男生自认为是民主党人。与其他大多数地方不同,大学中男性登记投票的比例高于女性:88%的男性大学生称已登记投票,而女性大学生登记投票的比率为82%。

男性和女性大学生在大学中的经历不同,他们正推动彼此政治化。男性似乎正在向右转,以应对他们认为的女性对其地位的“攻击”,而女生也因认为男性对其生育和其他自由进行限制,而向左转。十年后,美国可能会面临一个不仅在意识形态上、而且在性别上两极分化的社会。

美国第三政党发展面临困境

7月27日，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和前新泽西州州长、共和党人克里斯蒂娜·惠特曼 (Christine Whitman) 等两党议员联合创建了一个新的全国性政党前进党 (Forward Party)。

《国会山报》网站9月10日刊登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高级研究员迪娜·斯梅尔茨 (Dina Smeltz) 的文章，认为前进党并未准备好改变美国的政治格局。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民调显示，第三政党及其候选人获得了大量支持。今年7月的一项民调指出，58%的美国人表示，如果拜登和特朗普角逐2024年大选，他们会考虑投票给一个温和的独立候选人。YouGov同期的另一项民调显示，39%的人认为第三政党是必要的，31%的人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足以代表美国人。此外，第三政党在那些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的人中更受欢迎。

但是，第三政党派内部存在理念分歧。支持第三政党的共和党人希望新的政党向当前共和党的右边发展，而不是向中间发展；而民主党人则在希望一个更温和或更自由的政党之间产生分歧。这反映了既有政党的基本意识形态构成。前进党旨在吸引中间路线的美国人。但所谓的温和派选民也并非“铁板一块”。针对不同利益问题，一部分温和派会与其他温和派产生分歧。

总的来看，前进党发展依然面临许多困难。首先，前进党在筹款及资源方面不够成熟，短期内难以产生很大影响；其次，前进党团队希望让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支持前进党的原则，而不是离开他们注册的政党，为前进党投票。再次，前进党希望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开展政治活动，但分裂正是过去最成功的第三政党的成功之道，它们批评民主党和共和党，并将选民从两党那里吸引过来。

民主党能否打破共和党对各州的控制？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近日撰文分析了民主党在打破共和党在各州议会中优势所面临的艰巨挑战。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民主党组织“前进多数”（Forward Majority）近日发布一项研究报告称，在未来十年里，民主党人将在打破共和党在各州议会优势上面临艰巨挑战，这种优势使保守派能够广泛、迅速地推进其政治极化议程。该研究预测，在未来十年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党人在阳光地带各州的地位会有所提高，而共和党人可能会在中西部北部各州以及东北部部分地区取得进展。

研究认为，民主党人要打破共和党目前在州一级的主导地位困难重重。民主党人在这场争夺州权力的竞争中位于下风：当前共和党控制着 61 个州的议会，民主党只控制 37 个；共和党人在 30 个州控制着参众两院，而民主党人仅在 17 个州控制参众两院。如果算上州长，共和党人在 23 个州政府中拥有统一控制权，而民主党人只在 14 个州政府中有统一控制权。

研究认为，民主党人仅在六个州有机会翻转共和党在各州议会中的多数优势。未来十年，两党仍会在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开展争夺，共和党以微弱优势掌控这三州的议会。长期而言，在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和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的多数地位可能会出现缺口。

为了提高在战场州获胜的几率，“前进多数”认为，民主党必须加大关注在郊区和城市远郊地区，这些地区有 220 万未登记的潜在民主党选民，民主党应建立优势并塑造这些地区的选民。

该研究对民主党在白宫争夺战中的前景相对更乐观。其预测，教育的两极化、日益增长的种族多样性和更多来自其他州的白领工人移民，将同时改善民主党在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和得克萨斯州这四个阳光地带战场州的地位。民主党人将

在受过良好教育的选民中获益，而共和党人在没有大学学历的选民中日益强大。

另有 9 个州将作为临界点：拥有 47 张选举人团选票的五个州，主要包括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和内华达州，将略微倾向于民主党（得票率在 50-52% 之间）；拥有最后 75 张选举人团选票的四个州，即北卡罗来纳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将倾向于共和党。在近年来最大的两个战场州，威斯康星州和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的地位会更加稳固；艾奥瓦州和俄亥俄州也将仍然是坚定的红州。

布鲁金斯学会：从 2022 年初选看美政党派系斗争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9 月 7 日发布其有效公共治理项目创始主任埃琳娜·卡马克 (Elaine Kamarck) 执笔的报告《2022 年初选的教训——美国政党和中期选举将走向何方?》。报告第二部分分析了美国两党在 2022 年初选中的派系斗争。摘要如下：

2022 年，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的影响力甚至比伯尼·桑德斯在 2018 年初选中的影响力更明显。在这两个案例中，失败的总统候选人都试图通过鼓励志同道合的候选人参加国会初选来保持运动的活力。在 2022 年初选季结束时，传统观点认为特朗普已经接管了共和党。

为了测试特朗普的影响力，报告将共和党初选候选人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特朗普明确支持的候选人。第二类候选人的网站上有特朗普露脸的照片和/或对特朗普的称赞；这些广告通常是为了让观众觉得特朗普支持了这位候选人，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第三类候选人的网站上有对他们有利的照片和/或提到“让美国再次伟大”和/或“美国优先”。第二和第三类候选人通常是特朗

普的“追随者”——缺乏明确的支持，但试图获得特朗普选民的支持。在一些竞选中，比如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院竞选，我们看到候选人互相攻击对方对特朗普不够忠诚，或者他们试图把自己描绘成特朗普主义的最佳典范，即使他们没有得到正式的支持。

特朗普主导了共和党的国会初选——他支持的候选人几乎总是赢得选举。他没有支持的许多候选人试图在他们的竞选活动中加入一些特朗普的魔力，他们在自己的网站上介绍特朗普和/或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优先。他们的表现不如特朗普真正支持的候选人。

民主党方面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以“我们需要一场革命”而闻名的参议员桑德斯，在 2022 年大选中是一个比特朗普弱得多的派系领袖。桑德斯及其极左翼盟友和组织支持的国会候选人非常少。其中只有一半的人赢得了初选。报告还对在民主党左翼中流行的特定短语的正面提及进行了编码。略多于四分之一的民主党候选人在他们的竞选网站上使用了其中一个短语，其中约 40% 的候选人获胜。但或许 2022 年民主党初选最重要的教训是，近四分之三的民主党候选人远离民主党的极左势力——这与试图把自己包裹在特朗普旗帜下的共和党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过去十年中，每个主要政党都发现自己陷入了派系战争，但其对各方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在共和党方面，候选人都支持特朗普（即使特朗普不支持他们），并因此在初选中表现出色。在民主党方面，桑德斯革命的影响相对较小且更加温和，在初选中也不太成功。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